

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

陈佳荣

波涛汹涌、广阔无涯的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对外交通最主要的区域。人们常说“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丝瓷之路”，然而所谓“丝绸之路”，不论陆道、海道，应指中国对西方的远程交通，而非周边邻近的中外交往。南海向西的远航究竟起于何时？按照上古时代的科技水平，初期航海多沿岸边而行，故大规模的远航不可能太早。

就中西交通而言，西汉实可谓开拓时期。彼时陆道固有张骞之“凿空”，而海道南海至印度洋的远航路线也辟于西汉，与张骞通西域大致同时。在这方面，最早最详而又最明确的史载，莫过于《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下列记述：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耶。……元帝时，遂罢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此段史料尤其是涉外地名，近百年来迭经中外史家考证，然迄今犹言人人殊、未有定讞，有些今地比附之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例如，黄支今地究在何处？自藤田丰八、费琅定在印度东南岸后，颇得众人之拥护，但也有的考在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乃至非洲。至于航线中经诸地，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不打算探讨西汉时的涉外地名，而着重分析当时远航路线的始发点，唯将有关论著作为附录详列于后，并不一一另加注释。

本来上引史料所述的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似乎相当明确，不应有太大问题，可实际上却有不少意见分歧，诸如：对“障塞”如何理解？徐闻、合浦古港的今地何在？为何《汉书·地理志》未提及远航印度洋的始发点是番禺？而对于“障塞”等的分歧，还常常表现在不同的断句或标点上，兹略介诸说如下：

（一）动词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此说见于韩槐准的《旧柔佛之研究》，认为“日南即今安南顺化一带，汉武帝始置郡，所谓障塞，或指地方扰乱不能从陆路通行”。吴景宏《秦汉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的意见

相同。

(二) 名词说

1.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论者多采此说，以“障塞”作边徼要塞解，把日南边塞与徐闻、合浦同列为西汉远航的始发点。

2.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谓“案障塞无闻”（《二十五史补编》），或以之为不可考的地名。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朱一新曰：障塞犹筑亭乘障塞之障塞，非县名也。汪氏云障塞无闻，殊误。”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即作如上之标点，并于障塞旁加专名号。

3.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苏继庙《南海钩沉录》认为此徐闻、合浦与雷州半岛一带的徐闻、合浦为同名异地，属于日南障塞，“可假定徐闻在西卷海口，合浦在象林海口”。

4.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王新民、韩振华《公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汉书地理志附录考）》初解作：在中国最南部边界小城，“徐闻合浦船行……”（韩说）或“慢慢听到”合浦船行……（王说）。但后来韩先生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粵地条末段考释》已修正为“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赞成“徐闻即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

按上述将徐闻、合浦置于日南郡内，仅属假定，可置不论。将“障塞”作动词解，虽不无可能，然西汉时未闻日南地方有大乱事，缺乏有力之史料可为佐证。而观诸两汉史籍，大量材料均可说明上引“障塞”乃普通名词，既非动词，更非专有地名。兹不厌其烦加以引录：

《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除守徼亭障塞……”。

卷一一五《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障塞破坏，亭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严敕障塞，缮设屯备……”。

卷二〇《祭彤传》：“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卷廿二《马成传》：“缮治障塞……”。

卷廿四《马援传》：“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

卷四七《班勇传》：“……以逼障塞”。

卷四八《应劭传》：“故数犯障塞……”。

卷八七《西羌传》：“障塞亭燧出长城外……”。

卷九〇《鲜卑传》：“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乎”。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列两处记载：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提到，汉元帝曾派人口谕单于曰，“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

《后汉书》志廿八《百官志》载：“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

原来南、北方均有障塞，并设障塞尉治理，则该名指边徼要塞地区甚明。所谓曰南障塞，即位于西汉最南边的日南郡边疆，再往南便是史书常常提到的“日南徼外”了。至于其今地，由《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记载看，日南障塞实为日南象林界，即日南郡最南一县。西汉象林县治所，应即后来林邑国的早期都城典冲，位于武嘉(Vu Gia)河畔维川(Duy Xuyen)县南的茶莽(Tra Kieu)，但其南境应达到华列拉角(Cap Varella)和大岭(Dai Lanh)一带。

除了日南障塞之外，对于徐闻、合浦的考证亦不无歧见。徐闻是西汉合浦郡郡治。其今地，《广东历史地图集》标在海康即今雷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一文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在雷州半岛南端即今徐闻一带。据陈序经《东南亚古史初论》（载《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意见，航船如由海康出发，需绕过危险的琼州海峡，故或置于雷州半岛南端为是。合浦则在今广西北海市北面，与今合浦大致同地。另关于西汉、东汉合浦郡的郡治，《中国历史地图集》均标在合浦，而《广东历史地图集》均标在徐闻；然《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县五，依次为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后汉书·郡国志》之排序则改为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崖，显见该郡郡治在两汉有别。

由上所述，作为西汉南海向西远航之始发点，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三地是无可怀疑的。可是为何古代广州亦即番禺呢？近年来，论者多据《淮南子》所记“番禺之郡”与“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瑇瑁、果、布之凑”及一些考古发现，认为广州是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或东方发祥地，甚至主张上引西汉南海远航之起航点应是番禺，日南、徐闻、合浦只是作为番禺的外港而记载（见下列书籍的部分论文：《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版；《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古番禺是秦汉南海郡的郡治，曾为南越国国都。它无疑是秦汉之际乃至先秦时岭南地区的一大都会，海内外商品辐辏的贸易中心，但不一定非是最早的对外起航发舶港口不可，至少在西汉就未必如此。如果我们以“丝绸之路”指中国对西方的陆、海远程交通，则其开辟似未能早于西汉，至于西汉则明见于官方历史记录。《史记》、《汉书》史官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公文，如果番禺确是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则似不应无载。诚然，当时番禺集合了无数供海内外贸易的奇珍异物，但其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或为古代国内所产，或由外航港口运至都会（“都会”也可理解为“都城”），也不排除由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转

来。

在判定西汉南海对外远航始发点的问题时，除了史载、文物外，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1)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属汉朝版图；(2)依当时航行水平，北部湾乃南海最佳对外航行区域。

若据历史记载，西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之对外交通，应较番禺郡频繁。首先，汉代岭南九郡所属的交趾刺史部或交州刺史部，最初系以交趾郡治为治所，后来才移治今广州。《后汉书》志廿三《郡国五》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茀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为交州。”羸茀县今地，在河内西北一带。由交趾至日南既为当时中国最南边疆，州治又一度设于此处，其所濒临的北部湾自然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区，故东汉时究不事、叶调、掸国、天竺、大秦等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反观由珠江口出洋，如沿岸西行出北部湾，需经琼州海峡，如由深海经海南岛东面南下，需经七洲洋，而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若非后世航海科技水平提高，实难以达到。只有到东汉末以后，由于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国所据，其沿海一带已无复昔日之安宁，由北部湾出航逐渐变得危险，加上深海航行事业日益发展，故南海向西远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于是从六朝到隋唐，逐渐形成了“广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汉代的交州日南航线。

北部湾既是西汉南海对外远航的主要区域，为何将最南面的日南障塞放在最前，而非“徐闻、合浦、日南”呢？有无可能仍应标作“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即当时整个北部湾属于交州刺史部管理的军事要地——日南障塞，而北岸的徐闻、合浦均属其所辖？综观《汉书·地理志》载文，合浦、日南各郡条下县名属次分明，《后汉书·百官志》所记障塞尉只设于县，职掌有限，故似仍以三地并列为是。三地均可发舶，但其中首要起航点应为日南障塞。

总之，根据《汉书·地理志》的明确记载，西汉南海对外远航的主要区域应在北部湾。由此到后来的中国对外航海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或应引起吾人的注意：除了某些海禁、闭关时外，自古代到近代，随着航海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内地交通贸易来往的日益密切，以及中央政府对全国控制的加强，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主要起航点出现由南向北逐渐转移的趋势。在两汉，对外远航的主要起点在日南，形成《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交州日南对外航线；由吴晋至隋唐，广州大为兴盛，而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为标志；南宋至元代，泉州一度领先，故有《梦粱录》由泉州放洋过海泛往外国的记载；到了明初，起航点北移至福州、苏州，至郑和下西洋自五虎门或刘家港出发；及至清代，上海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

[附录]有关《汉书·地理志》中西航路记载之部分论述

伯希和：《诸蕃志译注正误》，原载于《通报》(Toung Pao)第13卷，1912年，第457-459

页；参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112-115 页。

Albert Herrmann. Ein alter Seeverkehr Zwischen Abessinien und Sud-China bis zum Beginn unserer Zeitrechnung, Berlin, 1913.

藤田丰八：《前汉に於ける西南海上交通の记录》，原载《艺文》第五年十、十一号，1914 年 10、11 月，后收《东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馆 1932 年版，第 95-135 页。另见郑师许译文，刊《新亚细亚》7:5，1934 年 5 月；《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刊《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919 年 5-6 月号，第 451-455 页；参见冯承钧译本，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71-114 页。

Laufer, B. ,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见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Luce, G.H. , Early Chinese Texts about Burma, Journal of Burma Research Society, XIV:2, 1924, pp.90-9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辅仁大学 1930 年；参见中华书局 1979 年校订本，第 19-21 页。

郑师许：《前汉时代海上交通考》，《交大季刊》1934 年第 14 期。

严挺：《读前汉时代海上交通考》，《人文》6:1，1935 年 2 月。

藤田元春：《汉书地理志通黄支国考》，《史林》24:4。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10 页。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25-28 页。

郑师许：《见于汉书中前汉海上交通的蠡测》，《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 4 期，1943 年 3 月。

石田幹之助：《南海に關する支那史料》，生活社 1945 年版，第 18-20 页。

王新民、韩振华：《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汉书地理志附录考）》，《海疆学报》第 1 期，1947 年 1 月。

劳榘：《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 年。

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5:2，1948 年 12 月。

苏继席：《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5:2，1948 年 12 月。

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南洋学报》5:2，1948 年 12 月。

Duyvendak, J.J.L. ,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9, pp.9-12.

谭彼岸：《汉代与南海黄支国的交通》，《社会经济学报》1951 年第 2 期。

苏继席：《黄支国在南海何处？》，《南洋学报》7:2，1951 年 12 月。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册），华岗出版有限公司 1953 年版，第 154-155 页。

王德明：《中菲关系史略》，《主义与国策》1955 年第 43 期。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14 页。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

志粵地条末段考释》，《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另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文丛》，1981年第1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577页。

王赓武：《南海贸易》第二章“通往黄支的路”，原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第31卷第2辑，1958年；参见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第24-38页。

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另见《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9-107页；《东南亚历史论丛》(2)，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

吴景宏：《秦汉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下)》，原载《大陆杂志》11卷7期，后收入《中菲关系论丛》，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版，第91-111页。

许云樵：《南洋史》上册，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版，第44-47页。

Paul Wheatl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1961, pp.8-13.

松田寿南：《东西文化の交流》，至文堂1962年版，第211-213页。

刘芝田：《中菲关系史》，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186-191页。

周连宽：《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另见《东南亚历史论丛》(2)，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

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创文社1967年版。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探索》，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版。

徐玉虎：《前汉书地理志载中印航海行程考》，《人文学报(辅仁大学)》第2期，1972年1月。

邱新民：《中国与东南亚航路的第一纪程》，《南洋文摘》13:3，1972年；另见《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1984年版，第157-163页。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李东华：《汉书地理志载中印航海行程之再检讨》，《史原》第8期，1978年9月。

内田吟风：《东アジア古代海上交通史泛论》，《(内田吟风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同期舍1978年版，第546-547页。

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1980年10月。

李成林：《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质疑》，汶江：《学术月刊》1981年第6期。

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第3期，1981年7月。另见《东南亚史论文集》第一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1980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7页。

Hall, D.G.E.,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1981, p.8.

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36 页。

官崎市定：《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 1985 年第四版，第 470-472 页。

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7-188 页。

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25 页。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8、172、196、285、421、643、694、715、780、917、938、963、1010、1017、1020、1039、1053 页。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 26 辑，1986 年 5 月。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 1987 年版，第 52-57 页。

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88 年版，第 58-63 页。

谢光：《都元国考》，《世界历史》1988 年第 6 期。

杨燊等：《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0-54 页。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1-167 页。

张毅：《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21 页。

苏继席：《南海钩沉录》，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30、129、184、190、298、396 页。

长泽和俊：《海のシルクロ史——四千年の东西交易》，中央公论社 1989 年版，第 53-60 页。

陈柏坚等：《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16、21-27、52-55 页。

孙毅夫等：《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画报社 1989 年版，第 175 页。

姚楠、丘进、陈佳荣：《七海扬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年版，第 29-34 页。

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8 页。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11 页。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 页。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1-254、324-330 页。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1991 年版，第 2-3、36-38、55-58、68-80、86-89 页。

徐恒彬等：《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9、126-127

页。

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胜友书局 1991 年版，第 23-79 页。

章巽等：《中国航海科技史》，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31、110-111 页。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95-101 页。

蒋祖缘、方志钦等：《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0-83 页。

吴家华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37-38、68-69 页。

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23 页。

黄时鉴等：《（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39 页。

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7-85 页。

徐德志等：《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4 页。

姚楠：《南天余墨》，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105 页。

司徒尚纪等：《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98、126-128 页。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2 页。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73 页。

汪廷奎等：《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9-281、379-384、529-552 页。

作者：陈佳荣，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毕业，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学衔。现兼任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及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

（本文选自《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 年）